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檳城惠州会馆研究（1822-1941）

THE STUDY OF PENANG FOOI CHEW ASSOCIATION (1822-1941)

陈矜伶

TAN JIN LING

17ALB02565

拉曼大学中文系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ULSZ3094 FINAL YEAR PROJECT II  
JANUARY 2021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檳城惠州会馆研究（1822-1941）

THE STUDY OF PENANG FOOI CHEW ASSOCIATION (1822-1941)

陈矜伶

TAN JIN LING

17ALB02565

拉曼大学中文系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ULSZ3094 FINAL YEAR PROJECT II  
JANUARY 2021

# 目次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3
第三节 文献回顾	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9
第二章 槟城惠州会馆发展史略	10
第一节 槟城惠州籍移民	10
第二节 槟城惠州会馆重建历程	13
i. 1869	13
ii. 1893	15
iii. 1921	20
iv. 1928	21
第三章 槟城惠州会馆会员籍贯、及会馆领袖	22
第一节 从神主牌谈会员籍贯	22
第二节 会馆领袖的贡献	26
第四章 槟城惠州人的信仰载体：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	31
第一节 海珠屿大伯公的追溯	31
第二节 惠州人与五属	33
第五章 结论	36
引用书目	38
附录	42

## 图目次

图 1—1 广东省暨汀州府诏安县捐题买公司山地碑·····	11
图 1—2 重修惠州馆碑记·····	14
图 1—3 重修后进碑·····	15
图 1—4 “泉志成城”牌匾·····	21
图 2—1 “义重梓桑”牌匾·····	35

## 表目次

表 1—1 槟城社团注册的名单·····	16
表 1—2 1825 年 5 月威尔斯太子岛华人社团 ·····	18
表 2—1 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调查·····	23
表 2—2 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之年代·····	23
表 2—3 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县份之比例·····	24
表 3—1 教育建设·····	26
表 3—2 社会建设·····	27
表 3—3 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与具体行动·····	28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陈矜伶 TAN JIN LING

学号：17ALB02565

日期：2021年4月24日

论文题目：檳城惠州会馆研究（1822-1941）

学生姓名：陈矜伶

指导老师：陈爱梅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马来（西）亚早期的华人社团主要分为血缘、地缘、业缘和神缘。会馆往往是重要的地缘组织，亦是同一籍贯华人移民的聚集之地。本文以马来西亚檳城的地缘组织，惠州会馆作为华人社团史的研究个案，梳理 1822 年到 1941 年的檳城惠州社群历史脉络，以及他们如何在福建人主导的檳城华人社会中保持本身的凝聚力。惠州会馆除具备敦睦乡谊的功能，还是同乡共同祭拜祖先的地方，而五属共同管理的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更是跨越地缘组织的精神载体。本论文使用会馆和庙宇的中文碑记、牌匾来厘清檳城惠州会馆的重建历程，也运用未曾发表的神主牌数据分析理解社群内部的县份分布，逐页翻查为期十年的《檳城新报》以整合惠州人对地方建设的贡献，最后再探究惠州人如何透过神权构成地缘结盟的社会网络。

**【关键词】**： 地缘； 檳城惠州会馆； 神主牌； 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

## 致谢

这份论文的诞生，经历不少磨难，庆幸的是在在去年疫情稍微受控的情况下得以前往槟城惠州会馆实习，从中收集了不少资料。虽然行动管制令期间无法回校上课，不过还是感谢校方能够开放图书馆，让我们不至于沦落毫无参考书目的地步。

首先得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爱梅老师。感谢老师的教诲，在必要的时候提点我，指引我从迷茫中找到方向，更是愿意抽空带我进行田野调查。老师偶尔的关怀也为我在论文撰写的路程增添不少动力，让我顺利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同时，也要感谢槟城惠州会馆的理事提供我到会馆实习的机会，尤其是现任署理主席，拿督刘志荣律师在我实习期间的协助与指导，黄裕端博士对我在《槟城新报》文献搜集上的引导，以及会馆总务，刘再来先生在我对会馆事务有所困惑时为我一一解答。

接着，感谢我的父母在精神、经济上的支持与鼓励，由于时常得往学校图书馆跑，再遇上禁止跨州的条规，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金宝。不过，他们依然谅解我，让我尽力而为。最后，还要感谢与我并肩作战的知“食”分子们，一起天天到图书馆报到，共度三点一线的生活。虽然我们的研究领域不一致，但是他们在我倍感压力的时候承包我的笑点，为这烦闷的时光添赋不少色彩。在此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诸位，我将铭记于心。



# 第一章 绪论

19 世纪以来，南渡马来亚的华人络绎不绝。他们之所以南移，一方面是受中国情势所迫，促使他们决定持着冒险的精神，远赴海外寻找更好的商机。早期的中国迁民群体中属南方福建和广东为主轴。从地理上而言，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濒临南中过海，从南中国海顺着东北季风往南航渡，近的直达越南和菲律宾群岛，远的则达暹罗、马来亚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sup>1</sup>随着大量华人定居马来亚，不仅形塑当地的华人社群，华人社团也逐渐建立。重视地方观念的南来华人考量安全、娱乐、互助等因素，同一方言群体便自然和谐地聚集在一起。<sup>2</sup>基于有着强烈的原乡意识，他们参与会馆组织作为彼此的依恃力量。故此，马来亚的地缘性会馆居多，无疑是共同方言基础上的驱使，形成一个以地域方言作为划分标准的社群分类。

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位于槟岛的一个地缘性组织——惠州会馆，并把年份介于 1822（会馆成立）直到 1941 年。笔者先从惠州先贤移民马来亚的历史背景为基础，探讨该会馆早期的历史脉络、重建历程，后梳理会员的籍贯及会馆领袖的建设贡献。这项研究透过惠州会馆如何从籍贯组织、神主祭祀、神庙来探索华人移民的互助精神，亦是本论文的意义所在。

---

<sup>1</sup> 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 20。

<sup>2</sup> 颜清湟著，栗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35。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18 世纪末，中国华人陆续以劳动力的形式来到东南亚各地谋生。他们坚守落叶归根的思想，希望在侨居地发财致富后，得以光荣回归故里。因此，即使他们身处海外，仍对国内事务特别关心，但凡任何事故都必会给予积极的响应和支持。一般上，华人社团主要分为几大类型，如血缘、地缘、业缘、神缘组织，负责照顾从中国到来的原乡族群，给予关怀与帮助。

檳城作为福建人居多的地区，在人数与经济上占优势，必会造成华人社会的少数群体产生不安感，进而导致他们更为团结，在组织社团方面也相对积极。<sup>3</sup>福建群体在檳城的经济活动上处于核心地位，众多经济运作必会经过福建五大姓氏商人之手，所涉及的经济领域包括贸易、船运、采锡、经济作物种植、鸦片餉码承包。<sup>4</sup>

我们从 19 世纪初期在檳城的会馆成立年份可见，嘉应会馆（1801 年）、增龙会馆（1801 年）、香山会馆（1805 年）、广东暨汀州会馆（1819 年）、从清会馆（1821 年）、惠州会馆（1822 年）、台山宁阳会馆（1833 年）、顺德会馆（1838 年），当中以广东和客家群体占多数。因此，本论文欲探究作为少数群体的惠州社群如何在强势群体支配的经济地位占一席之地。

本文以惠州会馆作为研究对象，因为笔者在踏入大学之前，对本身的籍贯并不清楚，加上父辈对此也没有深究。直至透过课堂教学才了解籍贯的概念，并且得知自己的祖籍为惠州陆丰。而且，笔者在机缘巧合下到檳城惠州会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活动。透过实习工作坊，笔者对会馆有进一步地认识与了解，同时也发现参与会馆者当中的年轻会员比例颇低。这或许是因为年轻一代对籍贯意识与认知概念较弱，故此引发笔者对此课题产生兴趣，利用会馆仅有

---

<sup>3</sup> 颜清湟著，栗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39-40。

<sup>4</sup>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5), 41-42.

的文物等资料来厘清该会馆的史略并整理成文，让后人参阅。鉴于该会馆仅存的史料多为 19 世纪末直至 20 世纪初，所以将研究锁定在 1941 年日军入侵马来亚之前。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这项研究欲透过仅有的史料，发掘惠州社群在檳城的历史脉络。笔者尝试利用搜集的资料来厘清该会馆跨越两个世纪的拓殖史实，以及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来考察会馆的文物，如碑记、神主牌等了解早期惠州先民的参与人数及其概况。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其一、收集和整理零散的史料，编写成文，向前人致敬，且置后人参阅；其二、透过会馆保留的碑记和牌匾了解该会馆早期的重建历程，以及探究惠州社群与其它社群的关系；其三、利用会馆供奉的神主牌来探索会员的籍贯分布，再从其它文献如报刊对该会馆领袖在檳城的贡献进行考证。

笔者认为此项研究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所以趁着经历百年的部分文物尚未遭遇风化之时，将其记录保存，并与所搜集的文献内容相印证，让后世参考。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为了对马来（西）亚早期的华人社会历史有一定的掌握，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的《The Chinese in Malaya》（1948）、林水椽、骆静山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和颜清煌著的《新马华人社会史》（1991）三书是笔者在探索华人社会所参考的书目。由于无法查获巴素博士的原著，因此本文引用刘前度的译本（1950）。这书主要针对马六甲、檳榔屿、

新加坡、马来各邦，在二战时期和马来亚光复后的华人历史进行记述。<sup>5</sup>《马来西亚华人史》以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宗教信仰等角度去剖析马来亚华人在经历南移、二战时期、直至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与变化。<sup>6</sup>颜清煌一书则探讨新马华人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职能，其组织可区分为方言、宗亲、秘密会社三大类型。作者以华人社团内部的角度来考察当时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文化、教育。<sup>7</sup>书蠹编，顾因明和王旦华译的《槟榔屿开辟史》<sup>8</sup>（1959）、张少宽著的《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sup>9</sup>（2003）及《槟榔屿丛谈》<sup>10</sup>（2005）、陈剑虹与黄贤强的《槟榔屿华人研究》（2005）和谢诗坚所著的《槟城华人两百年：写下海外华人历史第一页》<sup>11</sup>（2012）皆是对槟城当地的社会背景有所认识的书籍。再者，本文亦参考英文的槟城历史书籍。《Penang -- Past and Present 1786-1963》（1966）一书记载三个时段的槟城历史，分别为莱特领导时期、英殖民政府介入时期，以及马来西亚独立后时期，当中涵盖有关行政制度、社会问题、地图等记录。<sup>12</sup>Jean Elizabeth 和 DeBernardi 撰写的《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2009），叙述文化信仰在早期的槟城华人社会中如何传承与演变，以及其信仰在现当代期段的角色转变。<sup>13</sup>此书围绕华人帮派、庙宇来讨论文化信仰在随着时代所产生的本土性变化。本文亦参考《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sup>14</sup>（1959）、《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sup>15</sup>（1971）作为熟悉早期的槟城私会党背景的参考书目。

---

<sup>5</sup> 巴素博士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

<sup>6</sup> 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

<sup>7</sup> 颜清煌著，栗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

<sup>8</sup> 书蠹著，顾因明，王旦华译，《槟榔屿开辟史》（香港：南华出版社出版，1959）。

<sup>9</sup> 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

<sup>10</sup>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5）。

<sup>11</sup>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写下海外华人历史第一页》（槟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2012）。

<sup>12</sup> *Penang -- Past and Present 1786-1963* (George Town :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1966).

<sup>13</sup> Jean Elizabeth,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sup>14</sup> Leon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 (New York: J.J. Augustin Incorporate Publisher, 1959).

<sup>15</sup> 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有关华人社团的研究，本文参照吴华著的《马来西亚会馆史略》（1980）、石沧金著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2013）。前者主要介绍马来西亚各州和各帮的地缘性组织与其历史，范围仅限于地缘性组织的会馆研究。<sup>16</sup>后者则将华人社团归纳为几大类型，分别为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文（学）缘性、宗教和秘密会社，并分析这些社团的发展史。<sup>17</sup>作者针对华人社团的内部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进行一番探讨与分析，书中亦谈及华人社会与当地华人社会在教育和文化等方面之间的关系。

笔者将所收集的资料归纳为两类，分别是多元和单一的会馆研究。以多元的会馆研究，如潘明智的《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1996）、黄贤强的《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2008）、《马来西亚惠州（府属）会馆史稿》（2018），以及廖文辉、黄义斌的〈马来西亚客属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2020）。潘明智一书从中国华人移民东南亚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再谈论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期间面临的问题，延申至华族方言群组织的成立与其扮演的角色，以及宗亲会馆组织从古至今的功能。该书是对新加坡宗乡会馆进行全面性研究，探讨宗亲会馆在不同时代的功能转变。<sup>18</sup>《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是以新加坡的客籍会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各个会馆的发展史略以及时代变迁之下的改变，其中潘慧珠撰的〈从新加坡惠州会馆的历史与发展看其独特性〉，将时段切分为会馆成立至战前（1822-1942），以及战后至今，对比会馆在历经新加坡开埠时代、旧殖民时期、日治时期、自治建国后采取的功能转变。<sup>19</sup>《马来西亚惠州会馆史稿》则是探讨马来西亚各州的惠州会馆发展史，分析会馆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其中谈及檳城惠州会馆在 20 世纪前后的进展与改变。<sup>20</sup>廖文辉与黄义斌一文主要整理马来西亚从 1801 年至 2006 年的各属客家地缘会馆，以分析各属会在各州的分布情况。<sup>21</sup>本文不认同作者把惠州

---

<sup>16</sup> 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

<sup>17</sup>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sup>18</sup> 潘明智，《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

<sup>19</sup> 潘慧珠，〈从新加坡惠州会馆的历史与发展看其独特性〉，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8），页 212。

<sup>20</sup> 惠州市档案局，惠州学院海外惠州人研究，《马来西亚惠州（府属）会馆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sup>21</sup> 廖文辉、黄义斌，〈马来西亚客属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会馆当作是客家地缘组织的说法，因为方言组织并不相等于地缘社团，相关论述将会在本文第三章提及。

接着，高静宜、陈中和的〈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与广肇会馆关帝诞初探〉（2019）依据祭品、祭拜仪式、恭读祭文等活动来对比两间会馆的关帝祭祀文化。<sup>22</sup>文中以不同的地缘会馆祭祀活动之差别，讨论原乡认同的概念。华人群体仍保留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代表着华人对传统文化的共同认同；而不同方言群在祭祀细节上的差异则象征他们保存着各自的习俗与规范。姚政志在其〈新马地区的妈祖信仰与移民社会〉（2004）一文谈及，新马地区的妈祖信仰多与地缘组织结合，形成以方言群体、同乡概念为主体的信仰活动与方式，与中国及台湾的民间信仰有别。<sup>23</sup>因此，即使是具有聚集各方言群或帮派之性质的妈祖崇祀，在新马地区却被方言集团化，而成象征某一帮群的神祇。此文透过对新马地区的妈祖信仰之探讨，不仅了解其时代变化，同时也得以窥视新马华人的社会生活史。以上二文皆是以结合宗祠与庙宇的多元会馆研究。

单一的会馆研究者有宋燕鹏的《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2020）、郑名烈《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2014）、吴云龙《遭遇帮派：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2009）、葛立功的〈槟榔屿潮州会馆的功能演变（1920-1960）〉（2013）以及郭平兴的〈20世纪前马六甲惠州会馆研究〉（2018）。宋燕鹏一书以吉隆坡福建社群作为考察个案，借雪兰莪福建会馆为考察对象，从80年代初期谈论中国社会变迁、闽省政治经济危机、福建移民南度马来西亚的拓荒潮，再到中叶后吉隆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英殖民政府引进华人移民的考察，分析二战前吉隆坡福建移民的祖籍地分布及社群领导层的构成，探讨不同方言群的华人帮派如何形塑吉隆坡福建移民社群的认同意识，以及探讨雪兰莪福建会馆和安溪会馆的功能与运作。<sup>24</sup>该书除了运用田野调查、政府档案，主要的文献还有雪兰莪福建

---

<sup>22</sup> 高静宜、陈中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与广肇会馆关帝诞初探〉，《八桂侨刊》2019年第4期，页40-43。

<sup>23</sup> 姚政志，〈新马地区的妈祖信仰与移民社会〉，《政大史粹》2004年第6期，页116。

<sup>24</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页1-4。

会馆保留下来的二战前档案，如会馆会议簿和义山收据等第一手文献，这在马来西亚是异常难得且珍贵的史料。郑名烈一书以吉隆坡永春社群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永春人从中国迁徙到马来西亚的背景因素，永春社群如何在吉隆坡形成与永春会馆的设立，还谈及吉隆坡永春人对该地区经济领域的贡献和成就。<sup>25</sup>作者亦运用吉隆坡永春会馆会员名册的第一手内部档案资料，来探析入会者的居住地、祖籍地乡镇、隶属宗族等基本资料。吴龙云著的则以槟城二个华人的跨越帮派的社团组织，即平章会馆和中华总商会作为研究个案，着重讨论广福两帮领导在不同性质的组织中之合作模式，以及跨帮合作背后的关系与意义。<sup>26</sup>

葛立功的〈槟榔屿潮州会馆的功能演变（1920-1960）〉除了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为研究方法，还使用计量统计的方式来分析收支账簿。该文从“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认同”三大方面来讨论该会馆的社会历史背景，再从会馆的年度收入与支出情况、会议记录来梳理会馆的会务转变与社会功能。<sup>27</sup>文中也透过会馆管理层的更替来分析该结构变迁对整体组织的影响。郭平兴一文主要梳理 20 世纪前马六甲惠州会馆的早期历史，以梳理会馆成立的社会背景、创立和会馆功能等等。<sup>28</sup>他通过马六甲在 19 世纪初叶的人口数量对比来分析当地惠州会馆的成立因素，运用史料来发掘该会馆的创建、组织结构与其功能。

同时，笔者亦参考陈爱梅〈马来西亚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关系探析：以槟城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为考察中心〉（2017）来了解槟城惠州社群的方言群属性。文中以槟城西南区的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作为研究对象，讨论美湖的福佬及客家两大群体的昔与今，分析来自相同地缘群体械斗的原因。<sup>29</sup>通过此研究，笔者了解槟城惠州人非仅限于客家方言群体，而是包括福

---

<sup>25</sup> 郑名烈，《海外桃园：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吉隆坡：华研研究中心，2014年），页7。

<sup>26</sup> 吴云龙，《遭遇帮群：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页14-19。

<sup>27</sup> 葛立功，〈槟榔屿潮州会馆的功能演变（1920-1960）〉（福建：中国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页12。

<sup>28</sup> 郭平兴，〈20世纪前马六甲惠州会馆研究〉，《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页29。

<sup>29</sup> 陈爱梅，〈马来西亚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关系探析：以槟城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为考察中心〉，《全球客家研究》2017年第9期，页183。

佬语系。此文亦提及，美湖是惠州的大本营，据墓碑资料，来自惠州十属的人占据美湖人口高达 41%，因此我们从中得知美湖是槟城惠州人聚集地之一。

针对槟城惠州会馆的研究，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较为稀少，仅有槟城惠州会馆出版的《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2003）。<sup>30</sup>另外，以马来西亚整体作为范围，除了各州惠州会馆在特殊时节出版的特刊如《马来西亚海陆会馆一九九〇年纪念特刊：回顾与展望》<sup>31</sup>（1990）、《雪隆惠州会馆馆史》<sup>32</sup>（2007）和《马来西亚北霹雳太平惠州会馆一百卅一周年暨新会所闭幕典礼纪念特刊》<sup>33</sup>（2008），有关惠州社群研究的书籍还有《惠州人在马来西亚》<sup>34</sup>（2001）、《惠州名人》<sup>35</sup>（2015）。《惠州人在马来西亚》及《惠州名人》属于非学术性著作，二书分别收录惠州名人的自传与结合马新 22 间惠州乡会团体的简介等。当中针对槟城惠州会馆有功的先贤之生平进行简单说明，惟提及人物数量不多，且有关槟城惠州会馆的创办与发展史过于简短。

纵观而言，有关槟城惠州社群的研究略显薄弱，除会馆自行编写的特刊之外，部分书籍虽提及该会馆，但是在研究视角上却是大同小异。故此，笔者尝试以过去未曾使用的史料为基础，从学术角度对此课题进行探讨。

---

<sup>30</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槟城：槟榔屿惠州会馆，2003）。

<sup>31</sup> 丘盛添，《马来西亚海陆会馆一九九〇年纪念特刊：回顾与展望》（森美兰：马来西亚海陆会馆，1990）。

<sup>32</sup> 马来西亚惠州社团总会，《雪隆惠州会馆馆史》（吉隆坡：雪隆惠州会馆，2007）。

<sup>33</sup> 《龙现凤鸣》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北霹雳太平惠州会馆一百卅一周年暨新会所闭幕典礼纪念特刊》（太平：北霹雳太平惠州会馆，2008）。

<sup>34</sup> 丘伟田，廖师兴，《惠州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惠州属团体总会，2001）。

<sup>35</sup> 孙浩鑫，《惠州名人》（八打灵再也：雪隆惠州会馆，2015）。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历史学科的社团史研究方法，进行考证、综合与分析。基于本文所论述的是1941年前的华人社团，按照石沧金先生的说法，那时马中两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尚未达成解决前，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更准确地说是华侨社团。<sup>36</sup>《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对华侨社团的定义如是解释：“初期移居海外的华侨，是通过血缘、地缘、业缘作为纽带，自觉建立一种互助、联谊、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sup>37</sup>本文所要探讨的华人社团，是以地缘同乡为纽带，自发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模式。这项研究不仅单纯处理华人会馆成立和发展过程，亦着重于论述1941年日军入侵马来亚前惠州社群在槟城的发展情况。本文运用第一手资料如会馆碑记、牌匾、神主牌、庙宇的碑铭等，借报章作辅助资料，分析其社群在槟城华人社会的历史建构。

本论文以槟城惠州会馆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利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会馆的碑记、牌匾和神主牌进行搜集、整理与分析。笔者曾在2020年6月至9月之间到槟城惠州会馆实习，对这些历史文物进行汇整工作。因此，文中将列出相关的碑记和牌匾内容，作为书写重建历程的资料来源。另外，笔者透过归纳分析神主牌上题写的内容，探讨槟城惠州社群的所属县份，并仔细阅读《槟城新报》的〈本屿〉版位，简略论述惠州会馆领袖在1920至1930年对槟城社会的参与与贡献。

---

<sup>36</sup>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页10。

<sup>37</sup>庄炎林、武杰主编，《华侨华人侨务大词典》（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页716。

## 第二章 槟城惠州会馆发展史略

槟城惠州会馆（1822）并非马来亚创立的第一所惠州会馆，最早的惠州会馆属 1805 年成立的马六甲惠州会馆。然而，这个说法是缺乏有力证据支持的。此章节论述惠州籍移民在槟城的分布区域，再从槟城惠州会馆的重建历程谈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

### 第一节 惠州籍移民

惠州隶属广东省东南沿海地区，管辖九县一州，称之“惠州十属”。本文所指的“惠州十属”并非当代中国行政意义上的惠州，而是如同槟城惠州会馆楼上神主龕两边的楹联题写的十县：“惠（惠阳）博（博罗）和平（和平）喜见龙（龙川）河（河源）浮旭日，紫（紫金）连（连平）长（长宁）久欣闻海（海丰）陆（陆丰）庆丰年”。

莱特（Francis Light）在 1786 年占领槟榔屿后，就有华人随后大量涌入，大多从事手工业、零售业、商业、种植等。惠州人正式迁移至槟城的时间，难以考证。从地理上来看，槟城的港口是华人移民入境北马的重要渡口，亦是进入大山脚和霹雳的跳板。<sup>38</sup>惠州是中国最大的矿产地，南下的惠州群体自然而然进入矿区工作。

---

<sup>38</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96。

1874 年之前，中国尚未有驻外使馆，故华人移民只能依靠彼此，建立组织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无形中成为当时华人社会的“政府”。华人社会发生的大小事，都交由私会党组织的“公司”或“会馆”处理，因而产生“政府中的政府”之别称。<sup>39</sup>

道光二年（1822），檳城惠州人已组织惠州公司。当时的会馆建筑是由乡老李兴以墨西哥银三百二十五元买下两间砖瓦屋和一段地皮，并捐送给同乡充作憩息之所。据广东暨汀州府道光八年（1828）的捐款碑记（图 1—1）记载，“惠州府题银七十七元一不半”名列第五，可见惠州人在广汀社群占据一定的数量与经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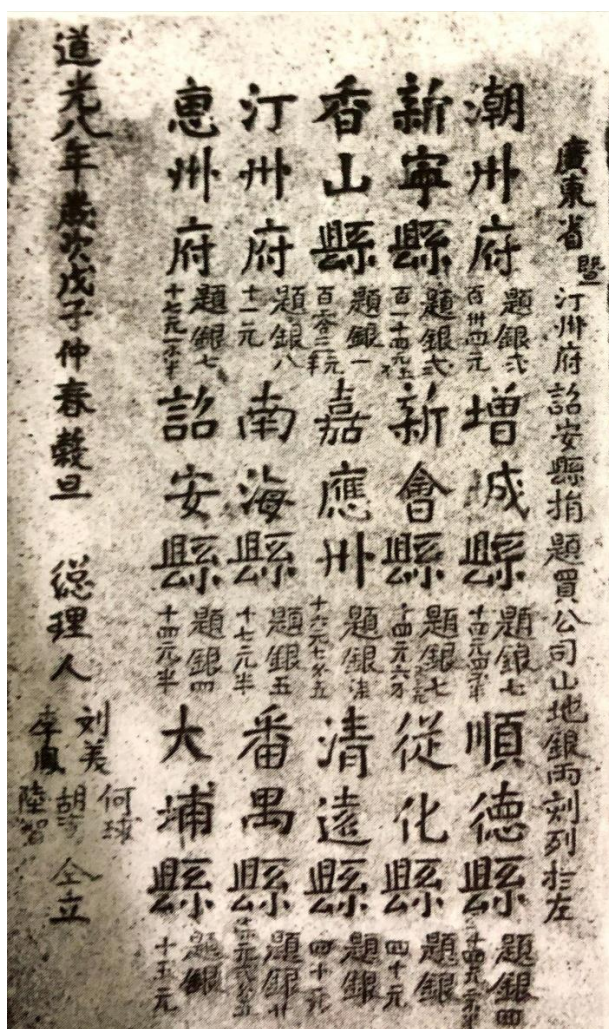


图 1—1 广东省暨汀州府詔安縣捐題買公司山地碑

资料来源：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出版部，1982

<sup>39</sup> 王琛发，《檳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44。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槟城惠州人大多聚集在以下几个地区，即大山脚、美湖、鲁乃、浮罗山背、双溪槟榔等。以大山脚的玻璃主义山，或称“县署山”（Bukit District Office）为例，在可辨识的 42 块墓碑中（1857-1877），惠州府之墓与潮州人持平，各占百分之三十八，惠州府内为陆丰人最多，归善县居其次。而在玻璃主义山过后建立的高巴三万（Kubang Semang）华人义山，可识别籍贯的 186 块墓碑（1874-1969），惠州府有 39 人。<sup>40</sup>另外，位于美湖的水长华人义山，339 个可识别籍贯的墓碑中（1868-2015），惠州人占据 140 个。<sup>41</sup>前述的两个地区，得以从义山墓碑的统计与研究寻找惠州人在此地生活的踪迹。浮罗山背的惠州人回忆，他们的祖先是在明末清初从暹罗入境吉打，后来定居于浮罗山背。而在 1856 年，浮罗山背已建有公冢，且有不少惠州人的碑墓。此外，还有叫“张三伯”、“张庆伯”、“何东伯”的惠州人，这里的“伯”是个尊称，起初也是浮罗山背种胡椒的园工。<sup>42</sup>在双溪槟榔，惠州群体是该地区华文学校的发展主力。新民义校的领创者彭李胜、卢振胜等人皆是惠州人；后来学生演剧筹款也有黄无骄、黄石安等人参与。<sup>43</sup>惠州人在十九世纪迁居鲁乃，且早在光绪丁未年（1907），鲁乃华人义山已建有惠州十属的总坟。作为鲁乃镇开拓功臣之二的卢文仪和孙亚厘，他们开荒耕地，大量种植木薯、橡胶和椰子，生意与产业拓及居林和槟城，促进地方经济与社区发展。<sup>44</sup>

---

<sup>40</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西海岸中等城镇华人移民社会的形塑途径——以巴生、金宝和大山脚为中心的类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 期，页 72-73

<sup>41</sup> 陈爱梅，〈马来西亚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关系探析：以槟城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为考察中心〉，页 200。

<sup>42</sup> 黄尧，《星马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页 76

<sup>43</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119。

<sup>44</sup> 潘碧丝、马瑛，〈马来西亚鲁乃福德祠研究〉，《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 9 卷第 2 期，2020 年 12 月，页 72-73。

## 第二节 槟城惠州会馆重建历程

惠州会馆的重建历程可从现存的碑记追溯，“重修惠州馆碑记（1869）”“重修后进碑（1893）”“槟榔屿惠州会馆重修礼堂记（1965）”“槟榔屿惠州会馆重建大厦简史（1975）”，本文仅着重探讨前两个碑记。此外，该会馆还有多幅匾额，其中一幅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的牌匾亦可证实该馆的重建历程。

### i. 1869 年

槟城惠州会馆在初期以乡老李兴捐赠的砖瓦屋和地皮为栖息地，从现有的遗迹看来，本文推测同治八年（1869 年）岁次己巳孟夏月吉日为首次重修（图 1—2）。此次的筹募获得同乡的热切响应，共有 160 余人捐献，筹获约莫三千四百五十五元。黄陈庆、李辛酉、罗元有慷慨捐献百元以上，其中黄陈庆捐献金额高达二百六十元。

黄陈庆名列榜首，不仅证实了他是惠州人，亦说明他当时的地位在惠州会馆是处于领导者阶层。<sup>45</sup>除了地缘性的捐款，他的名字在 1861 至 1895 年之间频密出现在槟岛与大山脚的不少碑文记录，如广福宫、大山脚福德正神庙、大山脚义学堂等。但是在槟岛，他在惠州会馆的捐款数目相对较高，1869 年之后则较活跃于大山脚的华人社会捐款，更是担任不少重要地位。<sup>46</sup>本文对照同治四年（1865）的重修海珠屿大伯公碑记来与惠州会馆的这幅碑文，发现几个重叠的人物，如黄陈庆、罗元有、陈金养、张观生，而陈金养当时还担任该庙的经理。对此，我们可以发现，同个领袖兼任多个华人社团的职位，是一种跨越社会组织的体现。

<sup>45</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58。

<sup>46</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5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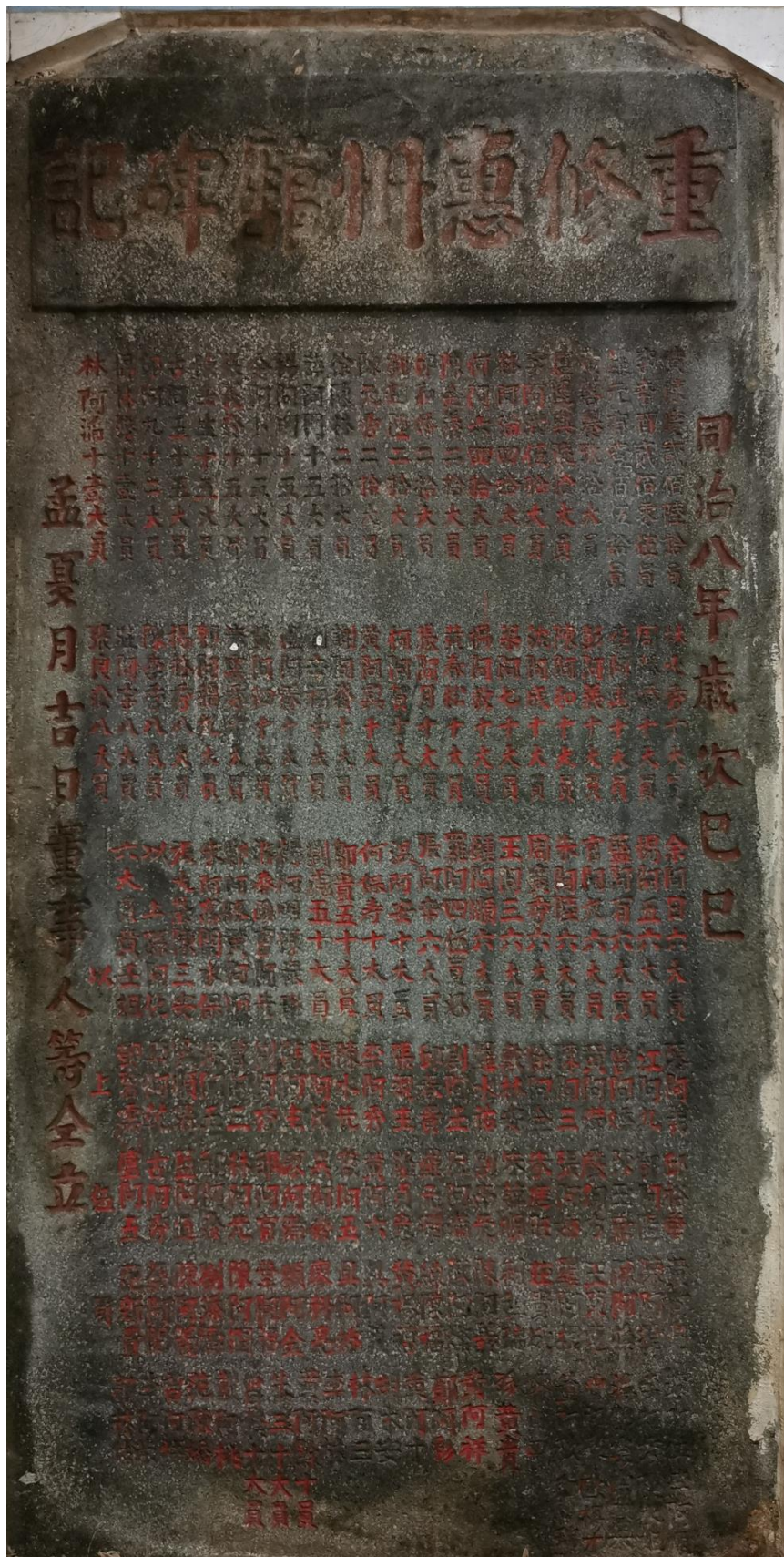


图 1—2 重修惠州馆碑记（2020 年 10 月 1 日摄）

ii. 1893年

这块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岁次癸巳的“重修后进碑”碑记，相信是惠州会馆的第二次重修，且是重修完毕后方立碑（图1—3）。这次的重修共获128人的热心捐款，筹得一千四十五元左右。这年名列榜首的是胡捷发，捐献四十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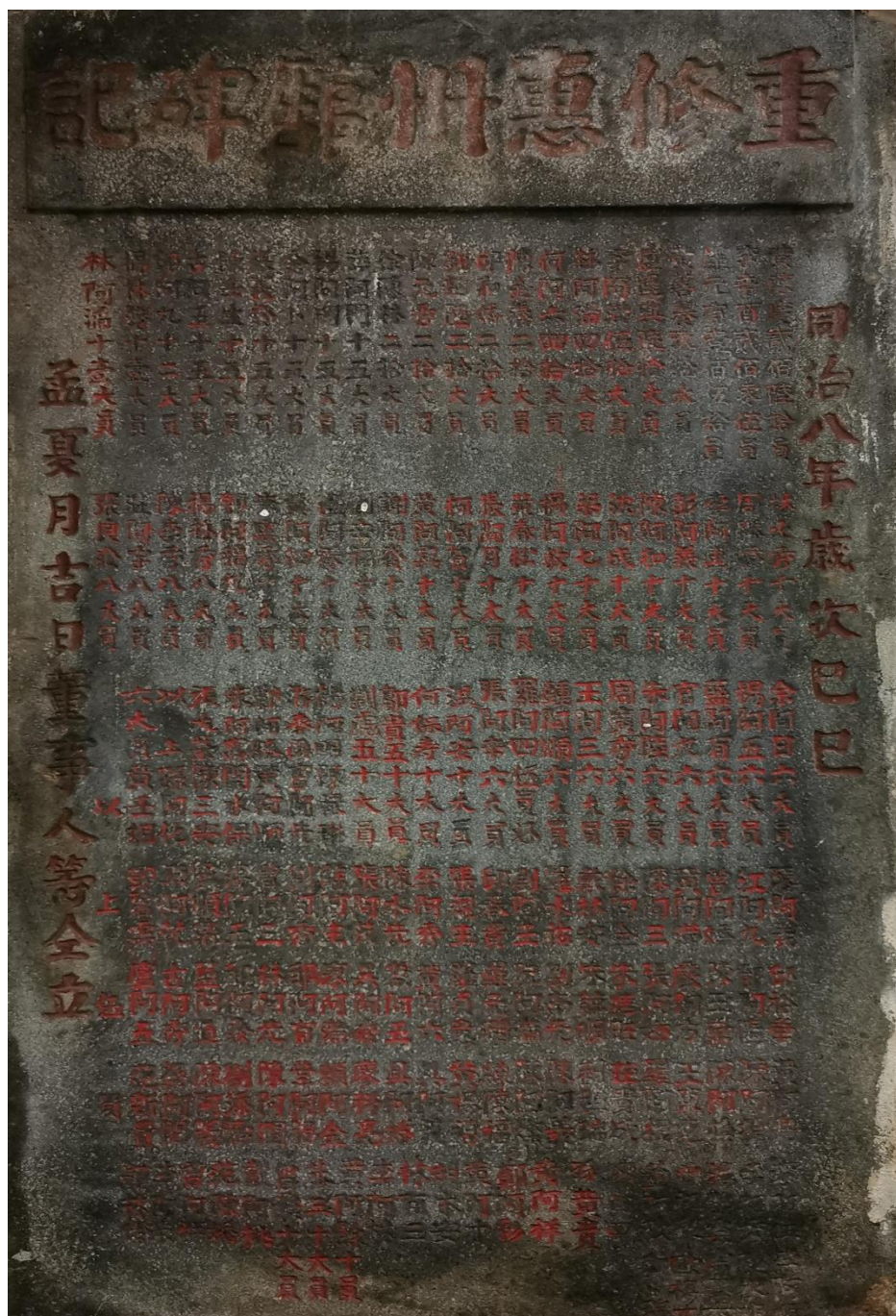


图1—3 重修后进碑（2020年10月1日摄）

相对 1869 年，这年碑记的捐献者名字不仅完整，且其中数十位以“XX 合”，两人合并的方式捐款。

若把 1869 年和 1893 年的碑记作比较，可发现一项不同之处。前者的捐献者中多番出现“阿”和单字名的结合，如阿满、阿秀、阿娇；后者则无出现这种现象，反而频繁以合捐的形式捐献。针对前者，有学者认为，此举是因为捐献者的文化水平不高，不太识字；二来是担心记名后会遭遇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当时的槟城时常会发生会党之间相互攻击的现象，再来也为避免海峡殖民政府的监控。<sup>47</sup>本文认同第二种说法，猜测这与 1890 年正式实施的社团注册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 1889）息息相关。全部社团一律得向政府办申请注册手续，而惠州会馆注册于同年 8 月 28 日（表 1—1）。在那之前，惠州会馆（Wye Who Khoon）曾被认作是“槟城早期华人私会党的七个团体”之一出现在 1825 年 5 月的威尔斯太子岛的华人会馆名单中（表 1—2）。<sup>48</sup>

表 1—1 槟城社团注册的名单

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登记日期	备注
1	Tong Kheng Siah	同庆社	31st December, 1890.	
2	Hong Tien Siah	洪天社	22nd October, 1890.	
3	Neng Yang Wui Kun	宁阳会馆	20th August, 1891.	
4	Tseng Leng Jin Seng Kun	圣灵金圣宫?	27th Do.	
5	Ka Eng Kun	嘉应馆	10th March, 1891.	
6	Tan Kongsi	陈公司	11th September, 1891.	
7	Chew Kongsi	周公司	20th August, 1891.	
8	Lim Kongsi, Kew Liong Tong	九龙堂林公司	Do.	
9	Chün Gi Siah	存义社	27th October, 1890.	
10	Toh Kongsi, Cheng Luan Siah	清銮社杜公司	20th August, 1891.	
11	Bien Gi Siah	绵义社?	31st December, 1890.	
12	Lo Pak Hong	鲁北行	19th August, 1891.	
13	Pak Seng Hong		Do.	
14	Eng Siew Tong	英寿堂	22nd April, 1891.	
15	Jin Gi Siah	敬义社?	9th December, 1890.	
16	Io <sup>n</sup> Kongsi		19th August, 1891.	
17	Hui Lan Siah	慧兰社?	9th December, 1890.	

<sup>47</sup> 惠州市档案局，惠州学院海外惠州人研究，《马来西亚惠州（府属）会馆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页 49。

<sup>48</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25-26。



18	Khu Kongsi, Liong San Tong	龙山堂邱公司	20th August, 1891.	
19	Do., Bun San tong	文山堂邱公司	Do.	
20	Teo Kongsi	张公司	Do.	
21	Chin Guan Siah	清关社	12th November, 1890.	
22	Tun Bun Tong	敦文堂?	9th December, 1890.	
23	Hong Seng Siah	丰胜社?	5th November, 1890.	
24	Poh Tek Siah	宝德社	27th August, 1891.	
25	Chia Kongsi	谢公司	20th Do.	
26	Kim Lan Siah	金兰社?	20th Do.	
27	Cheng Ho Siah	清和社	19th Do.	
28	Yiap Kongsi, Tong Yang Siah	南阳堂叶公司	20th Do.	
29	Wong Kongsi	黄公司	20th Do.	
30	Te <sup>n</sup> Kongsi	邓公司	27th Do.	
31	Tiechiu Lo Pak Hong	潮州鲁北行	19th Do.	
32	Hang Kang Ke Bio	韩江家庙	19th Do.	
33	Ong Kongsi, Thai Guan Tong	太原堂王公司	27th Do.	
34	Do., Sam Huan Tong	三槐堂王公司	20th Do.	
35	Ang Sun Gi Siah	洪顺义社	19th Do.	
36	Boey Kongsi	梅氏家庙	20th Do.	
37	Hui Chiu Hui Kun	惠州会馆	28th August, 1890.	
38	Ng Kongsi	伍氏家庙	20th August, 1891.	
39	Lim Kongsi, Tun Pun Tong	敦本堂林公司	20th Do.	
40	Koa Kongsi	高公司?	20th Do.	
41	Kheng Hok Tong	庆福堂	19th Do.	
42	Ang Kongsi	洪氏宗祠	20th Do.	
43	Ta Kam Hong	打金行	19th Do.	
44	Beng Gi Siah	明义社?	12 <sup>th</sup> November, 1890.	
45	Chhan Kongsi	曾公司	4th October, 1890.	
46	Hong San Siah	洪山社	28th Do.	
47	Khoon Giok Siah		28th Do.	
48	San Wui Kun	新会馆	19th August, 1891	
49	Chong Cheng Wui Kun	崇正会馆	20th Do.	
50	Chi Yan Tong, Se <sup>n</sup> Ui <sup>n</sup>		19th Do.	
51	Oh Kongsi	胡公司	20th Do.	
52	Gun Kongsi		20th Do.	
53	Hong Ho Siah	洪丰社	20 <sup>th</sup> Do.	

资料来源：整合《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1912年

表 1—2 1825 年 5 月威尔斯太子岛华人社团

地点	社团名称	目前会员人数	成立年份	每年开会次数	主席名字	备注
Church Street	Nghee Hung-Khoo 义兴馆	468	约莫 24 年 <sup>49</sup>	2	Mun Affoh alias Appoh	永久
Prangin Road	Woh Sung-Khoo 和胜馆	147	约莫 15 年	4	Loh Aloke	永久
Ujong Passir	Hoy San-Khoo 海山馆	393	约莫 2 年	2	Hoh Akow	永久
Prangin Road	Choong Chang-Khoo 从清馆	175	约莫 4 年	3	Ow Yong Sow	每年选一次
Prangin Road	Wye Chow-Khoo 惠州馆	160	约莫 1 年	3	Lee Ahang	每年选一次
King Street	Yan Who-Khoo 仁和馆	17	约莫 20 年	3	Chan Achoon	每年选一次
King Street	Yeng San-Khoo 仁胜馆	16	约莫 30 年	3	Chung Ayyat	每年选一次

资料来源：整合王琛发编《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展史实》，槟城：槟榔屿惠州会馆，2003 年

1867 年，因党派之争触发的槟城暴乱事件涉及大量的华人与马来人，虽然引起当局的关注，推出不少管制方法，但由于政府仍需要私会党的协助来管制华人社会，因此对其存在保留适度的控制。当时执行的危险社团注册法令（Dangerous Societies Suppression Ordinance of

<sup>49</sup> 根据陈剑虹《走进义兴公司》，页 67 所显示的图表，该馆成立年份应为 24 年。

1869) 成效不彰, 私会党的力量依然远在政府之上。<sup>50</sup>英殖民政府指定所有社团必须注册, 但此制度也变相承认私会党的合法性, 促使他们更恣肆进行敲诈、勒索, 私会党活动持续活跃着, 会员甚至从大幅度增加。<sup>51</sup>党派之间的械斗亦层出不穷, 例如 1870 至 1871 年间大伯公会和义兴再次发生冲突。<sup>52</sup>由此可见, 当时的局势依然不稳定, 人民为了自保, 选择以低调的方式参与社会活动也是情有可原, 所以减少本身个人资料暴露的机率。1890 年的注册法令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1889) 规定所有社团必须注册为合法团体, 而殖民政府亦有权豁免该条例对某个性质的实施, 凡以消遣、慈善、宗教、文学为成立宗旨的社团皆可备好相关文件提出豁免申请。<sup>53</sup>同时, 它限制了中国国籍移民参加任何登记的社团, 若被逮捕, 将遭遇放逐且押回原乡。这不仅导致他们在马来亚享有的优裕境遇被剥夺, 回到中国后还得面对当局官吏的对付。<sup>54</sup>该法令对私会党采取镇压政策, 分裂会党领袖的权力, 以维持殖民地的良好秩序。该法令的实施有效缓解私会党之间的冲突矛盾, 偶尔发生的微小争执也处于受控的范围内。檳城五大私会党也把各自的印戳呈交予副华民护卫司雷氏 (G.C. Wray), 并陆续进行资产善后工作。<sup>55</sup>同年, 殖民政府设立华民参事局 (Chinese Advisory Board), 让不同方言族群派出代表出任, 保障华民的福利与权益。换句话说, 海峡殖民政府强势介入檳榔嶼的社会秩序, 在法令的监控下, 各个帮会深受镇压, 行动不如以往那般自由。虽然无法立马瓦解所有私会党, 不过历经几年的实施, 华人社会受到种种条规限制, 会党之间的自相残杀案例减少, 形成各自分流的方言群。这点可从 1896 年华民护卫司的报告中证明, “经过几乎八年的经验, 我能够深信地确定, 已经没有现存社团危及殖民地的和平了”。<sup>56</sup>私会党被全面解散停止活动, 各个组织也依法注册成为合法团体, 社会秩序得以重建, 华人社会中的紧张感得以缓解, 能够公开参与社团活动。

---

<sup>50</sup> Leon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 p.p 136.

<sup>51</sup> 巴素博士著, 刘前度译, 《马来亚华侨史》, 页 118。

<sup>52</sup> 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p 100.

<sup>53</sup>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Government Gazette, December 20, 1889”, 24 December 1889, p.p 10.

<sup>54</sup> 巴素博士原著, 刘前度译, 《马来亚华侨史》, 页 119。

<sup>55</sup>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Chinese Societies at Penang”, 24 December 1889, p.p 10.

<sup>56</sup> 巴素博士原著, 刘前度译, 《马来亚华侨史》, 页 119。

### iii. 1921 年

根据惠州会馆的馆史记载，现在位于槟城咸鱼埕（Prangin Lane）的双层楼建筑是在第一世战期间，由会馆领袖建议拆除旧馆，改为建立新馆，并把前门改成面向咸鱼埕。石刻门额“惠州会馆”右旁小字刻上“民国拾年仲春重建”的字眼。<sup>57</sup>1920 年由槟城惠州公司发出的启事中写道，槟城惠州公司经同人决议重建，各手续现已就绪，兴工在即，呼吁惠州同乡踊跃募捐，并公举刘开发、益成隆二人负责收款发条。<sup>58</sup>我们得知卢文仪是乐捐榜首者，故会馆楼下的礼堂取名为“文仪堂”。新馆重建完成后，会馆基础已告确立，凡属惠州男女，缴纳基金贰元便可成为永久会员。会员捐献的香油金是会馆经费来源之一，当遇紧急费用之际，便会发簿捐款，因此身为会长者，担负的责任颇为繁重。当时为了改善与促进馆务，召开会议进行章程修改，增加年捐，并考核会员的准确人数。<sup>59</sup>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得知几个线索。其一，新建会馆的礼堂位置，位于建筑基层。其二，会员捐助的香油钱充作会馆经费来源之一，以及自 1921 年始，惠州会馆的会员数量有所增进，且需要招集惠属人士共同加入会馆组织。<sup>60</sup>依据这三点，再追溯会馆接收的神主牌年份，两者之间必存在一定的关系。惠州会馆存放年份最早的是于光绪丁末年（1907）的神主牌，接着是 1920 年。虽然无法确认众多神主牌的接收年份，不过从当时会员的捐香油钱举动来看，可以假设会馆在重建后便设有祠堂来摆放神主牌，而祠堂位置可能与今日我们所见的位置一致，即在“文仪堂”楼上。而且，摆放在木雕桌上的双龙头香炉，是在光绪丁末年（1907）由众弟子赠送。基于祭拜的需求，因而出现报效香炉的举动。后来随着会员人数逐渐增加，祭祀神主的要求随之提升，因此相信后来 1963 年秋季的大工程也与扩展祠堂面积息息相关，但本文姑且不论。

---

<sup>57</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123。

<sup>58</sup> 槟城新报，《槟城惠州公司启事》，1920 年 5 月 26 日，页 7。

<sup>59</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史》，同上，页 29。

<sup>60</sup> 槟城新报，《告白》，1920 年 11 月 5 日，页 9。

依据会馆180周年的纪念特刊记录，并无提及这年的重建历程。此节将会以牌匾与《槟城新报》的报道进行梳理，尝试填补这段遗漏的资料。

霹雳唵吃惠州会馆和明新学校于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中秋廿四日敬赠“泉志成城”，以祝贺会馆重建落成誌庆的牌匾（图）。单凭一幅牌匾佐证此段历程，难免显得牵强附会，故以《槟城新报》的报道作为辅助。



图1—4 “泉志成城”牌匾（2020年10月9日摄）

同年8月21日，槟城惠州会馆通过报道声明谨择夏历八月廿四日为开幕之期，<sup>61</sup>此报道与牌匾上的日期是相符的。9月18日，惠州会馆为感谢X火开幕之期蒙怡保与吉隆两埠乡人的热心捐款而登报鸣谢。<sup>62</sup>里头提及由杨少芬、曹加运、孙雄英等人负责收款，可见这三人乃会馆的管理层成员。

本文运用文物与报章新闻等史料对该历程进行双重考证，还原这段被遗漏的历史记载。槟城惠州会馆如今的风貌虽然经历多次重修的痕迹，不过仍然保留着二十年代的主要轮廓。

<sup>61</sup>〈声明广告〉，《槟城新报》，1928年8月21日，第3页。

<sup>62</sup>〈鸣谢〉，《槟城新报》，1928年9月18日，第9页。

### 第三章 槟城惠州会员籍贯、及会馆领袖

这一章节是以槟城惠州会馆的神主牌作为分析文本，了解 20 世纪该会馆成员的籍贯分布。本文按照整理的神主牌样本进行初步的归类与分析，并讨论该会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核心人物与其对当地和中国的建设所付出的贡献。

#### 第一节 从神主牌谈会员籍贯

本研究所指的神主一词，意是古代东方社会的祭祀对象之象征物或依附物，普遍为木质或是石质的柱状或牌状物，其上题写或刻有受祭者的名号，<sup>63</sup>而神主多为牌状，故称“神主牌”。<sup>64</sup>本土华人社会中延续着原始的祖先崇拜，把对长辈的眷恋之情，转移到祖宗神灵之上，即是将这份情感寄寓于神主牌。随着时代的演变与发展，殡葬文化的普及，华人对于传统习俗的开放观念，以神主牌形式来悼念先人已是普遍的现象。后代大多将神主牌供奉在家中，部分子孙与无子嗣者则会选择将之供奉于宗祠的神龛，而惠州会馆同时也扮演着宗祠的角色，后代可在祭祀时节前来会馆焚香祭拜先人。

本文的神主牌资料是由陈爱梅与学生在 2014 年调查与整理，故 2014 年之后接收的神主牌将不计入其中。普遍上的墓碑籍贯研究，碑墓或神主牌上的“惠州”意指位于惠阳县的惠州

---

<sup>63</sup> 杨家刚，《先秦神主制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 19。

<sup>64</sup> 杨家刚，《先秦神主制度研究》，页 29。

市。<sup>65</sup>“惠邑”可指“惠州”或“惠阳”，同是指惠阳县的惠州市<sup>66</sup>。另外，归善县在 1913 年改称为惠阳县，故此本文将归善、惠州、惠邑与惠阳归为同一类。1914 年，永安县改为紫金县，神主牌中的“永安”一律归于紫金。

表 2—1 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调查

有年份	无年份
22	290

资料来源：整合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

表 2—2 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之年代

年代	人数	
	男	女
皇清/清	4	2
民国/中华/民	388	124
不明	78	68

资料来源：整合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

根据整理结果，表 2—1 显示该会馆共有 312 个神主牌，标有年份的 22 个，无年份则 290 个。清朝神主牌仅有 6 个，当中有 4 个是男性，2 个是女性。民国时期占 198 个，男性占 79%，女性占 63%，剩余的 108 个神主牌则无晓（见表 2—2）。其中 61% 的神主牌供奉二位或以上的牌主，最多可达十位。会馆的神主牌共供奉了 664 位牌主，男性的比例居多，高达 71%，女性仅占 29%。由于写有年份的神主牌数量有限，因此本文只针对少量的数据作出统计。在 22 个刻有年份的神主牌中，年份最悠久的属光绪丁末年（1907），相信是该会馆接纳的第一个神主牌。二十世纪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有 3 个，二战（1941 年）之前有 4 个，二战之后

<sup>65</sup> 陈爱梅，〈马来西亚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关系探析：以槟城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为考察中心〉，页 187。

<sup>66</sup> 陈爱梅，〈马来西亚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关系探析：以槟城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为考察中心〉，页 188。

（1942年）乃至六十年代末年代共12个，七十年代至今则3个。依据此数据，推论惠州会馆在20世纪初叶开始接收神主牌，而二战之后的数量最多。

神主牌蕴藏的不单是籍贯、官职，包括“客从哪里来”的细节。传统的中国农民，对其影响最深的就是村落，因为他们一生身处其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户籍上所写的村落名字就是他们最直接的籍贯印象。<sup>67</sup>在本地华人义山的墓碑上，一般的籍贯格式是县份籍贯，除了能够清楚划定墓主籍贯之间的无形边界，还可以为“乡里意识”提供泉源。<sup>68</sup>此县份籍贯意识亦运用在神主牌上，槟城惠州会馆的309个神主牌中，46%刻写县份籍贯。仅有6%的神主牌有村社的名称，这类现象可以推测为在20世纪的华人是家族南来的后代，而非第一或是第二代移民，故此对家乡的名字并不熟悉。然而，使用村社籍贯的牌主中，有来自紫金县南岭村以及陆丰南塘乌石乡荣阳堂的。

表 2—3 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县份之比例

籍贯	人数	所占比例 (%)	
博罗	10	3.21	
惠阳	83	26.60	
紫金	18	5.77	
海丰	8	2.56	
陆丰	12	3.85	
河源	5	1.60	
龙川	1	0.32	
其他	外省	6	1.92
	不明	169	54.17

资料来源：整合槟城惠州会馆神主牌

据表 2—3 所述，在 143 个可辨别籍贯的神主牌之中，属于惠阳县的有 83 个。紫金、陆丰和博罗的神主牌各有 10 余个；海丰 8 个，河源 5 个，龙川仅 1 个；和平、连平和新丰则无。在美湖水长义山也并无发现和平、连平以及新丰地区的墓碑；<sup>69</sup>大山脚最早的华人义山——玻

<sup>67</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页 142。

<sup>68</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页 146。

<sup>69</sup> 陈爱梅，〈马来西亚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关系探析：以槟城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为考察中心〉，页 200。



璃主义山十九世纪下半叶的 16 块惠州府墓碑，亦无发现以上三县的墓碑<sup>70</sup>。由此推论在槟城，这三个籍贯的惠州人极其稀少。

通过牌上刻写的信息，可以得悉神主的世系、同个牌位中多个牌主之间的关系、祭祀者的身份等。一般常见的是夫妇二人神主并为一牌，多为一夫一妻制，或者是一夫多妻制。妇人出嫁从夫，丈夫生前的仕宦官职与其荣获的恩荣，也会在其逝世后恩及妇人。以会馆年份最悠久的神主牌为例，牌主丁门洪氏太安人的题主<sup>71</sup>乃皇清例赠安人。这里以孙维厘之神主作参考，牌上题写他乃十三世系，由子三大房全孙等永祀（见附录：图一）。当中也有五至十个牌主的长生禄位，或是血亲的神位。

祠堂的建立，除了通过祭祀劳苦功高的族人神主，以达灌输后代以有功之人作为楷模，更好地为会馆组织作出贡献的教化效果。二来，让无后代子嗣的族人有安身之处，为他们的神主提供寝室，死后可以得到祭祀。华人社会向来注重祭祀文化，讲究尊祖敬宗，神主作为祖先神灵依附的载体，居于祠堂神龛之中，让族人得以透过祭拜祖先，起到凝聚同乡作用，促进组织的发展。神主制度，不仅是一种对逝去的祖先表达敬祖之心的一种方式，同时是华人对原乡籍贯的历史记载，是家乡概念传承的表现。此外，根据神主牌资料的统计，二十世纪初至 2015 年，惠州会馆会员的籍贯比例以惠阳县居首，紫金县次之，陆丰随后。这项分析印证槟城惠州会馆内有着不少福佬（或称海陆丰话）语系的惠州人，因此它不应该被归纳于客家会馆之中。此外，男性牌主的比例占整体的百分之七十一，说明早期南来的惠州人多为单身男性，或许是还未挣到足够资金回家就先梦断他乡，又或是选择孤身一人至死。

---

<sup>70</sup> 宋燕鹏，〈马来西亚西海岸中等城镇华人移民社会的形塑途径——以巴生、金宝和大山脚为中心的类型考察〉，页 72-73。

<sup>71</sup> 意指在将死者的生歿信息、相关的官职等题写在神主牌上。

## 第二节 会馆领袖的贡献

槟城惠州会馆方今能有一番成就，历届先贤功不可没。他们不仅见证会馆的发展，更积极响应槟城华社的建设工作。此章节依据馆内设有神主牌的先贤，集中谈论他们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期间对本地教育、社会建设方面的贡献，以及对中国事务的关心与采取的行动。

表 3—1 教育建设

序	捐助事件、担任职位	姓名
1	鲁乃华民学校 <sup>72</sup>	卢文仪（名誉总理） 孙荣光（财政、学董）
2	槟城钟灵中学 <sup>73</sup>	卢文仪（校董）
3	双溪槟榔新民义学校学生演剧筹款 <sup>74</sup>	黄石安（名誉总理） 黄无骄（售票员）
3	钟灵中学分区募款 <sup>75</sup>	卢文仪
4	商务学校 <sup>76</sup>	卢文仪（五百元）
5	槟城笃鹿马坑育华学校 <sup>77</sup>	卢文仪（一百元） 孙荣光 黄观德（二元）
6	嘉应大学建筑 <sup>78</sup>	卢文仪（董事长）
7	丽泽学校 <sup>79</sup>	卢文仪（一百元）
8	居林觉民学校建筑校舍 <sup>80</sup>	卢文仪（名誉总理，一千元） 孙荣光（名誉总理，一千元） 黄观德（名誉总理、本埠兼外埠 劝捐员，一千元） 林硕问（名誉总理兼财政，五百 元）

<sup>72</sup> 〈民国九年鲁乃坡华民学校职员一览表〉，《槟城新报》，1920年4月14日，页7；〈选举得人〉，《槟城新报》，1928年11月23日，页7。

<sup>73</sup> 〈本校选定十三年第二届职员一览表〉，《槟城新报》，1923年12月22日，页11。

<sup>74</sup> 〈双溪槟榔新民义学校学生演剧筹款宣言〉，《槟城新报》，1924年11月4日，页11。

<sup>75</sup> 〈钟灵中学分区募款启事〉，《槟城新报》，1927年9月1日，页13。

<sup>76</sup> 〈商务学校第一次捐款鸣谢〉，《槟城新报》，1920年8月13日，页7。

<sup>77</sup> 〈广告〉，《槟城新报》，1923年8月2日，页9；〈热心助学之可风〉，《槟城新报》，1923年12月31日，页11；〈嘉应大学近讯〉，《槟城新报》，1925年9月16日，页11。

<sup>78</sup> 〈来件照登〉，《槟城新报》，1925年7月31日，页11。

<sup>79</sup> 〈丽泽学校募款汇志〉，《槟城新报》，1925年10月29日，页9；〈丽泽社为失业华工演剧筹款事说几句话〉，《槟城新报》，1930年11月25日，页21。

<sup>80</sup> 〈居林觉民学校筹款建筑校舍启〉，《槟城新报》，1925年11月9日，页11；〈居林觉民学校鸣谢启事〉，《槟城新报》，1930年7月8日，页21；〈居林觉民学校鸣谢启事〉，《槟城新报》，1930年7月9日，页21。

		林廷光（协理员、本埠兼外埠劝捐员，一百元）
9	马六甲惠民学校 <sup>81</sup>	卢文仪（三百元、名誉总理） 黄观德（一百二十元、名誉总理） 孙荣光（五十元）
10	时中学校演绎筹款 <sup>82</sup>	卢文仪（二百元） 黄石安（董事） 温火兰（董事）
11	南洋女子工商学校 <sup>83</sup>	卢文仪（副总理、名誉总理）
12	星洲马里烈音乐会演剧筹款报效钟灵中学	卢文仪（名誉会长）
13	高勝吉抵华侨学校演剧筹款建筑校舍 <sup>84</sup>	卢文仪（三百元）
15	星洲公立培德平民学校 <sup>85</sup>	卢文仪（十五元） 孙荣光（十元）
16	槟城同善平民义学演剧筹款 <sup>86</sup>	卢文仪（主席团）
17	民众学校 <sup>87</sup>	卢文仪（名誉会长）
18	双溪大年新民学校学生演剧 <sup>88</sup>	卢文仪（十元） 黄观德（五元）
19	槟城雅南师范学校演剧筹款 <sup>89</sup>	卢文仪（主席团、十元）
20	华侨女子公学演女子白话剧 <sup>90</sup>	孙荣光（五元）
21	钟灵中学剧团团演 <sup>91</sup>	孙荣光（十元） 林廷光（六十元）
22	浮炉勿洞华侨公学 <sup>92</sup>	黄无骄（一十元）
23	中国幼稚园女子歌剧筹款	卢文仪（二十元）

资料来源：整合《槟城新报》1920—1930年

表 3—2 社会建设

序	事件	姓名
---	----	----

<sup>81</sup> 〈热心助学之可嘉〉，《槟城新报》，1927年9月1日，页12；〈马六甲惠民学校改选职员〉，《槟城新报》，1927年12月21日，页9。

<sup>82</sup> 〈热心助学〉，《槟城新报》，1927年9月8日，页12；〈时中学校欢迎紫罗兰演戏筹款汇志〉，《槟城新报》，1927年11月18日，页14；〈时中学校欢送会〉，《槟城新报》，1928年12月3日，页7。

<sup>83</sup> 〈南洋女子工商学校之新职员〉，《槟城新报》，1928年3月28日，页13；〈本埠南洋女子工商学校选举十八年职员芳名列左〉，《槟城新报》，1929年1月18日，页7。

<sup>84</sup> 〈助学佳音〉，《槟城新报》，1928年9月10日，页7。

<sup>85</sup> 〈星洲公立培德平民学校鸣谢〉，《槟城新报》，1930年2月20日，页24；〈槟侨热心教育〉，《槟城新报》，1930年5月13日，页24。

<sup>86</sup> 〈槟城同善平民义学演剧筹款委员会宣言〉，《槟城新报》，1930年8月4日，页24。

<sup>87</sup> 〈民众学校第一届委员〉，《槟城新报》，1930年9月6日，页16。

<sup>88</sup> 〈双溪大年新民学校学生演剧筹款〉，《槟城新报》，1930年10月13日，页4。

<sup>89</sup> 〈槟城雅南师范学校演剧筹款委员会〉，《槟城新报》，1930年11月22日，页25；〈雅南师范学校演剧筹款汇志〉，《槟城新报》，1930年12月16日，页21。

<sup>90</sup> 〈华侨女子公学演女子白话剧筹款鸣谢〉，《槟城新报》，1923年9月17日，页11。

<sup>91</sup> 〈钟灵中学特请明明德剧团演剧筹款汇志〉，《槟城新报》，1924年10月29日，页11；〈钟灵中学特请明明德剧团演剧筹款汇志〉，《槟城新报》，1924年10月22日，页11；〈钟灵中学特请明明德剧团演剧筹款启〉，《槟城新报》，1927年1月4日，页20；〈明明德剧团演剧筹款启〉，《槟城新报》，1927年1月14日，页19。

<sup>92</sup> 〈兹将本年职员一览表〉，《槟城新报》，1927年3月10日，页13。

1	槟城平民疗养医院 <sup>93</sup>	卢文仪（一千五百元） 黄观德（二百元） 孙荣光（一百元） 林硕问（五十元）
2	丽泽社为失业华工演剧筹款 <sup>94</sup>	卢文仪（名誉赞助员）

资料来源：整合《槟城新报》1920—1930年

表 3—3 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与具体行动

序	事务	姓名
1	槟城潮汕赈灾会 <sup>95</sup>	卢文仪（鲁乃代表） 孙荣光（鲁乃代表） 刘开发（特别劝捐员）
2	中国饥荒之赈款 <sup>96</sup>	卢文仪（二千元）
3	棉安善堂潮汕念佛社 <sup>97</sup>	卢文仪（一百元）
4	助赈济南 <sup>98</sup>	卢文仪（二千元）
5	阅书报社筹款救济伤兵 <sup>99</sup>	卢文仪（一百元）
6	华校学生联合赈济东北难民游艺会 <sup>100</sup>	卢文仪（售票员）
7	槟城明新社中国国术研究会中国幼稚园联合演剧筹款赈济祖国灾民 <sup>101</sup>	卢文仪（卖票员）
8	槟惠侨痛桑梓之沦亡赈灾 <sup>102</sup>	孙荣光（三十元）
9	援助侨工会 <sup>103</sup>	刘开发
10	居林华民公所董事部救积山东伤兵难民 <sup>104</sup>	黄观德（五十元） 林硕问（三十五元）

资料来源：整合《槟城新报》1920—1930年

纵观上述三表，二十世纪初的惠州社群对槟城的发展建设颇为热心，尤其是教育方面。

马来亚的华文教育浪潮在二十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活跃起来。奈何，英殖民政府将华人与印度人

<sup>93</sup> <鸣谢>，《槟城新报》，1928年9月3日，页7。

<sup>94</sup> <丽泽社为失业华工演剧款事说几句话>，《槟城新报》，1930年11月25日，页21。

<sup>95</sup> <槟城潮汕赈灾会协理部会议>，《槟城新报》，1922年8月29日，页6；<潮汕灾芳名录>，《槟城新报》，1922年9月11日，页6；<赈灾会职员表>，《槟城新报》，1922年9月19日，页7；<赈灾会职员表>，《槟城新报》，1922年9月22日，页7。

<sup>96</sup> <中国饥荒之赈款>，《槟城新报》，1925年8月14日，页9；1925年8月22日，页11。

<sup>97</sup> <棉安善堂潮汕念佛社诸翁捐款芳名名列左>，《槟城新报》，1925年9月17日，页11。

<sup>98</sup> <爱国热汇纪>，《槟城新报》，1928年6月1日，页12。

<sup>99</sup> <阅书报社捐款汇志>，《槟城新报》，1928年5月25日，页13。

<sup>100</sup> <华校学生联合赈济东北难民游艺会职员表>，《槟城新报》，1929年9月15日，页24。

<sup>101</sup> <槟城明新社中国国术研究会中国幼稚园联合演剧筹款赈济祖国灾民的宣言>，《槟城新报》，1929年9月19日，页23；<团体沿门卖票揭晓>，《槟城新报》，1929年10月2日，页23；<中国幼稚园女子歌剧X筹款委员会鸣谢各界热心家乐购者芳名以及进支数目册于后诂表扬附清结束>，《槟城新报》，1930年10月25日，页数不详。

<sup>102</sup> <韩江赈灾布告>，《槟城新报》，1928年7月9日，页9。

<sup>103</sup> <援助侨工会会议记>，《槟城新报》，1922年8月25日，页6。

<sup>104</sup> <居林华民公所董事部为劝捐救济山东伤兵难民启事>，《槟城新报》，1928年6月5日，页11。

视为外来临时居民，并没有资助他们发展母语教育。于是，华人社团是在自足自给的情况下，经过本身的努力资助华文学校的成立与建设。

黄石安<sup>105</sup>，广东惠州人，具体县份不详；温火兰<sup>106</sup>，惠州归善（惠阳）三多竹兴隆人，两人历任惠州会馆要职。刘开发<sup>107</sup>，惠州惠阳县平山人，在槟城经营大诚公司。这所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船务部与布匹入口及总代理批发之务，并借这两项生意致富。孙中山到槟城宣传革命，创办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他亦是发起人之一。<sup>108</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黄、文、刘三人汇合会馆的其他成员，通过议决拆去旧馆，改建新馆。<sup>109</sup>

卢文仪<sup>110</sup>乃广东陆丰大塘乡人，是鲁乃埠惠州社群的领导人物。会馆在 1921 年完成建竣，卢文仪是捐助最力者之一，他为 1920 年的筹募活动捐赠五千元余。<sup>111</sup>君好礼而仁，所为诸义举，不捐则已，捐则或千，或万，至若十百施零，更仆难数矣。<sup>112</sup>卢文仪在教育建设方面十分重视，积极投入众多华文学校的筹款活动并担任各个职位。他对中国家乡的事务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他汇款回国，协助大塘村建河岸大水闸、建设市场、植树造林等，让村民的生活得到改善。<sup>113</sup>对于中国的赈灾活动，他更是热心救济。陆丰县曾经经历好几年的饥荒，卢文仪便常年运米回县，协同县政府救济饥民。<sup>114</sup>卢文仪乐善好施，热心参与及资助当地的教育、社会建设，发迹后也不忘家乡公益事业，帮助发展家乡建设，为村人的福利贡献。

孙荣光<sup>115</sup>，广东惠州博罗县村尾围人，曾担任惠州会馆财政、会长等重要职位。孙氏与卢氏两家，都是在鲁乃发迹的。1938 年，他在参与抗日救乡运动，代表槟城区加入惠侨救

---

<sup>105</sup> 黄石安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二。

<sup>106</sup> 温火兰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三。

<sup>107</sup> 刘开发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四。

<sup>108</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64-65。

<sup>109</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29。

<sup>110</sup> 卢文仪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五。

<sup>111</sup> 〈槟城惠州公司启事〉，《槟城新报》，1920 年 5 月 26 日，页 7。

<sup>112</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69。

<sup>113</sup> 陆丰政协网，〈爱国华侨卢文仪先生事迹简介〉，2017 年 1 月 19 日，<http://www.lfszx.gov.cn/history/350.html>。

<sup>114</sup> 陆丰政协网，〈爱国华侨卢文仪先生事迹简介〉。

<sup>115</sup> 孙荣光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六。

乡会组织，更是担任该委员会副主席一职。<sup>116</sup>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机炸毁会馆的其中一间家店铺，后来孙荣光的公司出资修建，从租金扣除来还清这笔费用。<sup>117</sup>

林硕问<sup>118</sup>，惠州惠阳人。针对他的生平事迹，并无收获太多记载。不过依据他活跃公益的地区推测，他是居林一带的领导人物。黄观德<sup>119</sup>，惠州陆丰人，与林硕问同为居林的领袖，并曾在 1928 年出任惠州会馆总理一职。<sup>120</sup>

林廷光<sup>121</sup>，广东惠州人，具体县份不详。他与孙荣光一同参与 1938 年的抗日救乡运动。同年 10 月 26 日，他和孙荣光等人被选为调查桑梓灾情通讯处负责人，过后代表出席吉隆坡惠联代表大会，并与黄文山报效汽车作为出席代表的用途。<sup>122</sup>几日后，在雪兰莪举行马来亚惠侨代表大会，他是槟城区与会代表之一。<sup>123</sup>1939 年 12 月 26 日，他被选为“马来亚惠州会馆联合会”的槟城代表之一，第二届惠侨救乡会的职员，以及担任监察委员中的副主席一职。<sup>124</sup>

槟城惠州会馆的众多先贤在二十年代出任许多华校要职，更不吝于金钱上的捐助，这点充分显现了华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惠州人涉足的地点，不仅局限于槟榔屿，更是拓展至鲁乃、居林。从以上教育建设的记载，地区华校的建设同时反映了某个社群的经济势力概况。虽然惠州社群在槟城华人社会并非庞大的群体，但他们仍然对在地建设给予高度关注与热烈响应，反映出惠州人在华社的活动力，其功绩不宜随着时光而被淡忘。同时，先贤对中国家乡的公益慈善活动象征着他们在情感、行动上与故乡的联系，即使身在海外，依旧心系家乡。

---

<sup>116</sup> 南洋商报，《南洋惠州会馆代表大会》，1938 年 11 月 1 日，页 14。

<sup>117</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29。

<sup>118</sup> 林硕问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七。

<sup>119</sup> 黄观德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八。

<sup>120</sup> 〈惠州会馆特别通告〉，《槟城新报》，1928 年 5 月 24 日，页 13。

<sup>121</sup> 林廷光的神主牌，可见附录：图九。

<sup>122</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31。

<sup>123</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32。

<sup>124</sup>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32。

## 第四章 惠州人的信仰载体：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

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坐落在槟城东北县丹绒道光（Tanjung Tokong），成立于1792年，由五个会馆共同管理，分别为惠州会馆、嘉应会馆、大埔会馆、永定会馆和增龙会馆，或称之五属。五属同乡每年都会集体在大伯公诞辰节日前往该庙祭祀，祀奉组织有惠州之惠福社、嘉应州之嘉德社、大埔之大安社、永定之永安社。惠州会馆是在理事江一鸣于1950年农历正月初十前往参拜后，号召同乡集体祭祀，方成立惠福社。该叙述可在会馆理事立于公元1978年五月卅日的碑记上见得。

### 第一节 海珠屿大伯公的追溯

关于大伯公的身份，学界众说纷纭。韩槐准认为，大伯公属于水神，因为其神庙多建在滨海地区。<sup>125</sup>陈亚才将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地区祭祀大伯公的源流划分为两种，一是从中国南传过来的土地公——福德正神；另一种则是死后由人升格为神。<sup>126</sup>张禹东则将大伯公信仰视为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二重特性<sup>127</sup>。<sup>128</sup>综合学界对大伯公的看法，可以推断的是大伯公崇拜即是中国原乡的土地神，但其性质却与中国不同。在中国，土地公是安置在家外，有坛无屋；新

---

<sup>125</sup> 韩槐准，〈大伯公考〉，转引张翰璧、张维安、利亮时，〈神的信仰、人的关系与社会的组织：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及其祭祀组织〉，《全球客家研究》2014年第3期，页117

<sup>126</sup> 陈亚才，〈马来西亚大伯公信仰概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70），转引《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页358

<sup>127</sup> 二重特性指的是华人传统宗教的中华性，和其在东南亚地区融合当地文化后产生的变异特性，即称之为当地性。

<sup>128</sup> 张禹东，〈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页100-101

马地区的大伯公却是供奉在家里的香案底下，<sup>129</sup>甚至是建立一户庙宇主祀大伯公，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正是如此。

在檳城，大伯公兼具财神的功能。这类现象可从宝福社<sup>130</sup>到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的请火仪式内容观察，其中一环节是信徒向大伯公请安、拜香，这是出自于信众把大伯公视作开拓者的观念，故而希望大伯公保佑大家赚钱。另外，请火的火势也变成经济预测的单位，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的理事会从煽担炉发出的火焰观察其三次的高低强度，预测檳城在新的一年里上、中、下旬的经济运程。<sup>131</sup>这般看来，大伯公具备的神能性质便是土地神与财神的混合，这就是所谓的当地性。源于中国本土的神灵系统，在特定的环境下会随着生存处境的变化需求作出调整和变革，因此更容易被本地华人接纳，成为普遍崇拜之一。<sup>132</sup>虽然无法确定大伯公信仰在中国原土的实际神职，不过它并不属于本土神明<sup>133</sup>，而是对固有的原乡信仰上再概念化的产物。

至于大伯公被认作是客家信仰，原因出自于一神话传说。张理，偕同丘兆祥与马福春从中国乘船南来，在槟榔屿海珠屿的海边下岸并在该处落脚。他们死后，被当地人供奉膜拜。而最先抵达的张理就被奠定为槟榔屿的开山地主。此说法的由来，需追溯到三人的背景。传闻这三人属客家方言群，但具有史料证明的仅马福春墓石，在大伯公庙可寻见立于嘉庆十四年己丑“永定福春马府君墓”之墓碑，<sup>134</sup>因而出现众多研究常把海珠屿大伯公庙与客家组织划上等号的现象。今堀诚二博士则认为是地方社群为巩固庙宇产业拥有权，用以加强五属的凝聚力而虚构出来的。<sup>135</sup>因此，针对大伯公是张理化身的这一传说，事实上潜藏着一种单一民系开拓槟榔屿的神话隐喻。<sup>136</sup>

---

<sup>129</sup> 张维安，《东南亚客家及其周边》（台北：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3），页 29。

<sup>130</sup> 宝福社是建德堂的继承，坐落在檳城本头公巷门 57 号，主祀福德正神（大伯公）。

<sup>131</sup> 张维安，《东南亚客家及其周边》，页 33-34。

<sup>132</sup> 张禹东，〈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页 102。

<sup>133</sup> 对于大伯公非本土信仰的论述，陈爱梅在“台湾、马来西亚东南亚华文文化学术会议”中发表《拿督公与仙四师爷之比较》一文提出，并以中国陆丰上陈村的大伯公庙、《天官赐福》中出现的“大伯公”字眼作为论证。

<sup>134</sup>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新加坡：新加坡中文学会，1970），页 20。

<sup>135</sup> 今堀诚二，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檳城：嘉应会馆，1974），页 90。

<sup>136</sup> 吴诗兴，《福德正神的传说与信仰研究——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为例》（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12），页 187。



大伯公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无准确的答案，但祂不一定是某个方言群体的专有信仰，正如刘果因先生所言，祂可能是全槟城人所信仰的神明。祂是一个以地缘为单位的祭祀组织，将大伯公信仰视为神缘性祭祀与地缘性会馆之结合，展现该信仰在神圣的根基上具有凝集族人的社会关系之功能。

## 第二节 惠州人与五属

同治四年（1865）的碑文上记载“兹海珠屿大伯公，固粤汀都人士所籍。经前人创立庙宇以来，敷德泽于南邦”，说明这个阶段的大伯公庙以广汀帮为主体。不仅如此，广汀人亦为重建海珠屿大伯公庙进行募捐，捐献者有约莫三百四十人。<sup>137</sup>同治十三年（1874），尚可见得海珠屿大伯公乃广汀人之信仰的现象，“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冬吉旦，沐恩弟子伍积齐、伍于用、周兴扬、伍天池同敬送”的神台刻辞，其中伍积齐与周兴扬二人曾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修凉亭并整理山坟搬草碑》上出现。“近又得新宁伍氏兄弟积贺积齐二君，以五千余金购得一地”，周兴扬则在光绪十七年（1891）担任该山坟之总理。<sup>138</sup>由此说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广汀帮仍旧把大伯公当作信仰神明，并出钱出力协参与此庙的活动。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管理权是由哪个方言群体掌控，不过得以确认的是各籍人士都可参与募捐活动。

到了 1909 年，庙里开始出现“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龙五属”共管大伯公庙的标志。此类说法可在该庙的牌匾楹联等发现，里头有一幅在宣统元年己酉仲冬吉旦由五属仝奉的横匾，以及同年秋月吉旦重修的楹联，同由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龙五属同人仝奉。因此，相信打从 1909 年始，海珠屿大伯公庙已是五属族人主导的阶段。五属获得海珠屿大伯公庙的管

<sup>137</sup> 转引今堀博士著，刘果因著《马来亚华人社会》，页 75。

<sup>138</sup> 高丽珍，《马来西亚槟城地方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页 257。

理权，足以巩固其势力在华人社会的地位。五属中的方言群体如客家人、海陆丰的福佬，在槟城属次方言团体，后来随着五属中的客籍领袖在经济、社会地位的崛起，便牵动五属人士团结上进，争取族产。五属当中的客籍富商在 1893 年至 1930 年之间，在广福两籍人士为众的槟城华人社会中垄断中国驻槟城副领事一职。<sup>139</sup>槟城副领事是满清政府在槟城的官方代表，其责任是保护华商和华民。五属方言群体长期以来属于少数派，在权力福利不被保障的背景下，难免产生被忽略的心境。一当客籍领袖主导槟城华人社会，自然为这个边缘群体添赋了安全感，群体意识更为浓烈。因此，惠州、大埔、嘉应、增城、永定五个以操持客家方言为主流的地缘组织通过共同建立、管理海珠屿大伯公庙，相互联合以维护彼此身为弱小方言群的利益。

自 1918 年始，海珠屿大伯公庙发布在《槟城新报》的通告，启者均为海珠屿大伯公庙五属。接着，1919 年 1 月 15 日刊登在该报的一则新闻，推测是增龙会馆为争夺权力之事而发生冲突，召集大埔永定嘉应惠州五属家长在大伯公庙召开会议，裁判处理争执事宜。<sup>140</sup>这亦证实海珠屿大伯公庙的权力在二十世纪开始就为五属所掌握。同样的，1925、1927、1928、1929 等年份的会议通知，皆是以海珠屿大伯公五属董事部的名义发布在报刊，以此宣告五属乃该庙的管理者。

1921 年 10 月 6 日，汤日垣登报祝贺惠州会馆开幕谨颂之日，赠予“义重桑梓”四字。

<sup>141</sup> 同年，蕉岭（嘉应）汤日垣负责撰写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庙的册序，表示他是该庙的内部职员。由此看来，无论汤氏是以个人名义，或代表海珠屿大伯公庙抑是嘉应同人，能够推测当时的惠州会馆与其它五属社群的交际关系颇为良好。1928 年 9 月，大埔的戴芷汀先生令郎建龙结婚，X 胜芳、杨少芬、黄石安、温火兰、孙荣光等人在报刊中献上“夫妇齐眉”和“如月团圆”之贺语。<sup>142</sup>再者，会馆目前存放着一幅由戴氏家族（戴保生、芷汀、淑原、金源）共同敬赠“义重梓桑”牌匾，以庆惠州会馆乔迁（图 3—1）。按照会馆刊物的记载，这块祝贺牌匾是

<sup>139</sup> 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页 111。

<sup>140</sup> 标题不详，《槟城新报》1919 年 1 月 15 日，页 7。

<sup>141</sup> 无题，《槟城新报》，1928 年 10 月 6 日，页数不详。

<sup>142</sup> 无题，《槟城新报》，1928 年 9 月 25 日，页 7。

1921 年留下的。<sup>143</sup>这说明惠州社群与大埔社群在那段时期是有往来关系的。前段论述证明惠州人与其它四属的关系网络，透过神权而建构的地缘结盟。



图 2—1 “义重梓桑”牌匾（2020 年 10 月 1 日摄）

海珠屿大伯公庙是五属人士相互团结的一个象征，是透过神权作为集聚的根据，借助地缘和神缘的联系演变而成的大伯公信仰。这个信仰说明，弱小方言群以联合的方式，应对来自占据优势的闽粤方言群的竞争。同时，展现了侨民为适应新环境，维护实际利益，进而塑造新的族群认同。<sup>144</sup>海珠屿大伯公作为二十世纪五属同人在信仰基础上形塑的认同标志，是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建立的群体祭祀，不仅成为不同地缘组织的精神载体，更是彼此互相依靠的单位。

<sup>143</sup> 王琛发，《檳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页 153

<sup>144</sup> 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页 222

## 第五章 结语

会馆的建立源自共同的地缘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省、区、县，甚至是镇；共同的方言是其凝聚力，不仅能够无拘无束地与乡亲交流，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也会随之油然而生。<sup>145</sup>惠州会馆的创办人李兴初期以自己的陋舍作为同乡的落脚点，后来捐赠砖瓦屋和地皮充作会馆，让更多有需要的同乡抵槟后有个栖息之地。初来南洋的同乡，难免会对陌生环境感到不安。只有建立稳固的同乡情谊，乡人才能拥有足够的安全感来开展与当地的社会联系，可是在那之前自然就会依附与自己同一籍贯的乡亲，寻求庇护。当人数日益上升，就需要扩展空间来容纳众人，因而有了会馆的建设。槟城惠州会馆的各个重建历程象征各自的时代意义，从 1869 年第一次的重建碑记，发现惠州人参与海珠屿大伯公庙宇建设的痕迹，这是华人社团领袖的职务重叠的现象，以惠州人黄陈庆为例，他的名字在惠州会馆、海珠屿大伯公庙、广福宫、大山脚福德正神庙等多个社团的募捐碑记出现，说明他利用向各类社会服务、捐款的方式来换取在华人社会中的权威。1893 年的碑记体现了英殖民拟定的法令对槟城惠州人的心境影响；1921 年的修建则是祠堂建立的标志。本文运用新的史料——《槟城新报》的新闻报道以及相应的牌匾，印证 1928 年的这段重建历程，对会馆特刊的资料缺失进行补充。此外，本研究利用官方档案《海峡殖民地宪报》寻获惠州会馆在“1889 年社团注册法令”中的注册记录，证明该会馆在二十世纪后是作为一个合法团体出现在殖民政府档案，而非如十九世纪般以“交战团体”的形式存在。

槟城惠州会馆并没有设置义山，因此惠州人逝世后的葬地就是广东义山。随着祠堂的建立，惠州同乡得以选择将祖先的牌位安放在馆内。神主牌是后代子孙对其先人追远敬宗的方

---

<sup>145</sup> 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页 74

法之一，且能够起到强化籍贯认同的作用。神主牌上标明的籍贯，是启蒙子孙对祖籍地认同的方法之一。通过阅读牌上的文字，他们能够认知自己的祖先源自哪里，进而形塑祖籍意识。本论文运用槟城惠州会馆的神主牌资料，探究该会馆会员的惠州所属县份。这些会员多数来自惠阳县、紫金县、陆丰县，而二十世纪初期的惠州领袖多数源自这些县份。透过会员的籍贯研究，证实槟城惠州会馆属于地缘组织，当中的非客家群体——福佬人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不能将惠州会馆成为客家地缘会馆。这项研究也针对《槟城新报》在 1920 年至 1930 年期间的报道如启事、通告、致谢新闻等文献，整理出槟城惠州会馆领袖在本土与中国原乡建设上付出的贡献，为后世留下参照。

虽然从中国延续过来南洋的民间信仰带有鲜明的传统中华文化色彩，不过侨民在历经身处不同的人文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需求与条件，必然产生有异于中国的当地性文化特色，所以海珠屿大伯公随着当地社会的需求而形成不同的神格，即上述提及的二重特性。当在某个方言帮派占领主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下，相对弱小的方言群、地域群就会以联盟形式，应对来自其他强大团体的竞争，因而诞生五属共同管理庙宇的现象。这类现象也增强了五属同人之间的交流与往来，从各个团体的捐献记录中可以看出其跨越社群的网络关系。大伯公信仰扮演着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角色，是地缘纽带与神缘纽带的结合，体现华人身居千变万化的海外社会的适应能力。

这项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惠州社群在槟城的发展脉络，让年轻一代的惠州人对本身的祖籍背景、社群建构的历史有所认识。惠州会馆通过神主牌祭祀，不仅得以建构原乡籍贯认同的意识，让惠州乡人拥有精神寄托的载体，同时利用对海珠屿五属大伯公的祭祀，提供乡民心灵慰藉的场所，塑造社群信仰。综合上述，华人会馆、祖先祭祀、神祇信仰是构成一个社群认同的管道，通过以上三个途径来达到凝聚社群的作用。惠州会馆在槟城扎根，已跨越三个世纪，历代先贤的辛苦经营与付出都是后世有目共睹的。

## 引用书目

### 专书

巴素博士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

陈剑虹，《走进义兴公司》，槟城：陈剑虹，2015。

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出版部，1982。

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黄尧，《星·马华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1967。

惠州市档案局，惠州学院海外惠州人研究，《马来西亚惠州（府属）会馆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今堀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侨社会》，槟城：栢诚加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

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新北市：台湾商务，2019。

《龙现凤鸣》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北霹雳太平惠州会馆一百卅一周年暨新会所闭幕典礼纪念特刊》，太平：北霹雳太平惠州会馆，2008。

马来西亚惠州社团总会，《雪隆惠州会馆馆史》，吉隆坡：雪隆惠州会馆，2007。

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页 212-22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8。

丘盛添，《马来西亚海陆会馆一九九〇年纪念特刊：回顾与展望》，森美兰：马来西亚海陆会馆，1990。

书蠹著，顾因明，王旦华译，《槟榔屿开辟史》，香港：南华出版社出版，1959。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宋燕鹏，《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孙浩鑫，《惠州名人》，八打灵再也：雪隆惠州会馆，2015。

王琛发，《槟城客家两百年》，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98。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 180 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槟城：槟榔屿惠州会馆，2003。

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

- 吴云龙,《遭遇帮群: 檳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9。
- 萧新煌,《东南亚客家的变貌: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台北: 中研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 2011。
- 谢诗坚,《檳城华人两百年: 写下海外华人历史第一页》, 檳城: 韩江学院、韩江华人文化馆, 2012。
- 许云樵,《马来亚丛谈》, 新加坡: 青年书局, 1961。
- 颜清煌著, 栗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 饶宗颐,《中外关系史: 星马华文碑刻系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十卷七》, 台北: 新文丰, 2003。
-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 新加坡: 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 1969。
- 张维安主编,《东南亚客家及其周边》, 台北: 中央大学出版中心, 2013
- 林水椽, 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 雪兰莪: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 张少宽,《檳榔屿华人史话续篇》, 檳城: 南洋田野研究室, 2003。
- 张少宽,《檳榔屿丛谈》, 檳城: 南洋田野研究室, 2005。
- 张少宽,《檳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 檳城: 南洋田野研究室, 2013。
- 郑名烈,《海外桃源: 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2014。
- 庄炎林、武杰主编,《华侨华人侨务大词典》,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 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Leon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 New York: J.J. Augustin Incorporate Publisher, 1959.
- Penang -- Past and Present 1786-1963*. George Town :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1966.
- Jean Elizabeth,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 Wong Yee Tuan (2015),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 期刊论文

- 陈爱梅，〈客家的建构和想象——以马来西亚槟城大伯公信仰和海陆丰社群为例〉，《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四辑）2017年，页133-149。
- 陈爱梅，〈马来西亚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关系探析：以槟城美湖水长华人义山墓碑为考察中心〉，《全球客家研究》2017年第9期，页183-206。
- 高静宜、陈中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与广肇会馆关帝诞初探〉，《八桂侨刊》2019年第4期，页40-43。
- 郭平兴，〈20世纪前马六甲惠州会馆研究〉，《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页29-34。
- 廖文辉、黄义斌，〈马来西亚客属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页44-49。
- 潘碧丝、马瑛，〈马来西亚鲁乃福德祠研究〉，《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9卷第2期
- 宋燕鹏，〈马来西亚西海岸中等城镇华人移民社会的形塑途径〉，《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页65-78。
- 姚政志，〈新马地区的妈祖信仰与移民社会〉，《政大史粹》2004年第6期，页95-140。
- 张翰璧、张维安、利亮时，〈神的信仰、人的关系与社会的组织：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及其祭祀组织〉，《全球客家研究》2014年第3期，页111-138。
- 张禹东，〈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页98-108

## 报章

- 《槟城新报》，1919、1920、1922、1923、1924、1925、1927、1928、1929、1930年
- 《南洋商报》，〈南洋惠州会馆代表大会〉，1938年11月1日，页14
-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Chinese Societies at Penang", 24 December 1889;  
"Government Gazette, December 20, 1889", 24 December 1889.

## 学位论文

- 高丽珍，《马来西亚槟城地方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
- 吴诗兴，《福德正神的传说与信仰研究——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为例》，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12



杨家刚，《先秦神主制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档案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1912

网站

陆丰政协网，〈爱国华侨卢文仪先生事迹简介〉，2017年1月19日。

<http://www.lfszx.gov.cn/history/350.html>。

## 附录

### 一、照片<sup>146</sup>



图一：孙维厘神主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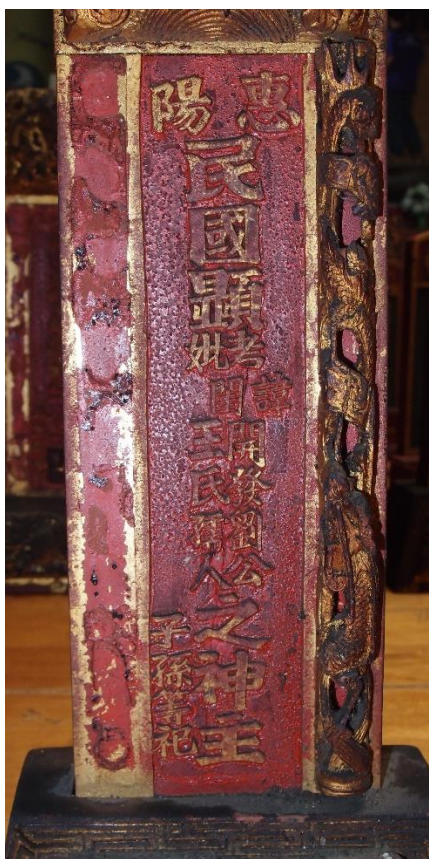
<sup>146</sup> 附录中的所有神主牌照片皆由陈爱梅与研究团队摄于2014年9月26日。



图二：黄石安神主牌



图三：温火兰神主牌



图四：刘开发神主牌



图五：卢文仪神主牌



图六：孙荣光神主牌



图七：林硕问神主牌



图八：黄观德神主牌



图九：林廷光神主牌

